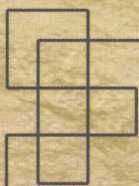


文学



杨亚林 著

现代形态的修复与重建

——论现代作家对新中国文学的审美期待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文学

现代形态的修复与重建

——论现代作家对新中国文学的审美期待

杨亚林 著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文学现代形态的修复与重建——论现代作家对新中国文学的审美期待 / 杨亚林著.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3. 3

ISBN 978-7-5622-5947-3

I. ①文… II. ①杨… III. ①中国文学—现代文学—文学研究 ②中国文学—当代文学—文学研究 IV. ①I20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21687 号

文学现代形态的修复与重建

——论现代作家对新中国文学的审美期待

◎杨亚林 著

责任编辑: 严 瑶 刘晓嘉 责任校对: 罗 艺 封面设计: 黄炜彬 罗明波

编辑室: 高校教材编辑室 电话: 027-67867364

出版发行: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址: 湖北省武汉市珞喻路 152 号 邮编: 430079

电话: 027-67863426/3280(发行部) 027-67861321(邮购)

传真: 027-67863291

网址: <http://press.ccnu.edu.cn> 电子信箱: hscbs@public.wh.hb.cn

印刷: 华中科技大学印刷厂 督印: 章光琼

字数: 210 千字

开本: 787mm×960mm 1/16 印张: 13.75

版次: 2013 年 3 月第 1 版 印次: 201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28.00 元

欢迎上网查询、购书

敬告读者: 欢迎举报盗版, 请拨打举报电话 027-67861321。



目 录

第一章 文学现代形态的构型	(1)
第一节 “文学革命”:文学现代形态的期待	(1)
一、胡适文学工具论	(2)
二、陈独秀与《文学革命论》	(6)
第二节 《中国新文学大系 1917—1927》:文学现代形态的历史化冲动	(8)
一、时代精神催生下的《大系》	(8)
二、现代文学精神和文学观念的体现	(14)
三、各种文类的现代形态的描述	(18)
第三节 30—40 年代:革命、战争中锻造的文学形态	(26)
一、30—40 年代社会变革与现代文学形态的发展	(26)
二、大众化运动与俄苏文学传统	(29)
三、各种文体的新发展	(37)
第二章 新中国的文学形态新变	(50)
第一节 两套丛书:新中国文学秩序的建立	(50)
一、“中国人民文艺丛书”	(51)
二、“新文学选集”	(54)
第二节 人民大众:从精神观念到政治实体	(56)
一、“人民大众”作为精神观念的存在	(57)
二、“人民大众”政治实体的生成	(59)
第三节 文学形态:希望与问题交织的文学现实	(61)
一、解放区的文学艺术类型再生的困难	(61)
二、现代作家艺术转型中的问题	(65)
三、创生新形式的难题	(69)



第三章 新中国小说现代形态的修复和重建	(73)
第一节 赵树理: 遭逢艺术困境的“方向”作家	(73)
一、方向作家与“方向”的缝隙	(74)
二、赵树理与文学形态重建的冲突	(78)
第二节 正典化: 当代观念与小说现代形态的媾合	(83)
一、史诗追求	(84)
二、自叙传小说传统	(89)
第三节 茅盾: 当代短篇小说形态辛勤的探索者	(96)
一、现实主义小说理论	(97)
二、茅盾与新中国短篇小说形态建构	(100)
三、茅盾的短篇小说评论	(104)
第四节 短篇小说笔谈与评说: 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叩问	(113)
一、短篇小说质的规定性	(114)
二、魏金枝关于短篇小说笔谈	(118)
三、茹志鹃小说的讨论	(121)
第四章 寻找诗神遗失的魔杖: 新中国诗歌形式问题与思考	(127)
第一节 现代诗人: 艺术的转型与探索	(128)
一、新中国的诗坛	(128)
二、现代诗人的矛盾与困境	(130)
三、“颂诗诗体”与革命诗歌传统	(133)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初期: 诗歌新形式建构的第一波浪潮	(139)
一、民歌形式的主导性	(140)
二、现代诗人论诗歌形式	(141)
三、诗质论: 建行的意义	(145)
第三节 何其芳与卞之琳: 诗歌现代格律的再造者	(147)
一、何其芳、卞之琳的艺术转向	(147)
二、何其芳的二次革命	(148)
三、卞之琳关于新诗形式的思考	(152)
四、民歌与格律的论争	(156)
第四节 民歌与格律: 诗歌发展道路探索中的现代回声	(161)

一、新民歌运动与五四新诗传统	(162)
二、格律诗问题	(165)
第五章 时代激流中散文艺术的自我寻找	(170)
第一节 复兴美文:现代散文传统的召唤	(170)
一、新中国散文问题与方法	(170)
二、笔谈散文与散文艺术形态建设	(175)
第二节 “意境”与模式:三大家散文艺术的深层问题	(182)
一、杨朔模式的精神源头及其建构	(183)
二、刘白羽、秦牧的散文难题	(186)
第三节 现代散文的遗绪:现代散文作家的审美期待	(189)
一、现代作家的当代散文创作	(189)
二、冰心:最属于自己的散文家	(191)
三、周作人:现代散文“闲话风”	(195)
余 论	(201)
参考文献	(205)



第一章 文学现代形态的构型

文学形态就其整体而言包含了文学的所有要素，可以由文学精神和观念倡导构成的，又是通过文学场域、文学教育和文学规训来完成的。其复杂性主要表现在它涉及文学生成机制和文学传播方式，尤其是文学制度的建立。^① 中国文学的现代形态不是自然的产物，它是各种力量通过不同的途径和手段塑造出来的。

第一节 “文学革命”：文学现代形态的期待

中国文学的现代形态的萌芽应该追溯到清末梁启超等人发起的“文界革命”、“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这些文学改良运动是在“新民”思想的指导下开始的，将古典文学中并不分明的文学类属概念划出畛域，而且在文学语体方面作了有限的却又相当可贵的探索。其倡导的“新文体”“是古文的解放”，“在那时代有很大的魔力”^②。“文学革命”的白话运动不是纯粹的开拓性工作，梁启超等人的探索为之提供了思维启示，又受到五四时代的召唤从而适时地出现了。陈独秀所说的“适之等若在三十年前提倡白话文，只需章行严一篇文章便驳得烟消灰灭”^③表达出这么一个意思：以提倡白话文为标志的新文学运动是文学历史发展的必然造成的。文学革命是在梁启超等人的文学改良基础上开始的，却又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运动，成为新文化运动一个重要部分。以科

① 罗钢：《危机时刻的文化想像——文学·文学史·文学教育导论》，江西教育出版社 2005 年。

② 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 1917—1927·〈建设理论集〉导言》，良友图书印刷公司 1935 年。

③ 陈独秀：《答适之》，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 3 册），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第 177 页。





学、民主的思想为支撑和以西方近代以来的文学新成果为参照，中国新文学开始了它的现代之旅。其中胡适的文字工具论、陈独秀的革命精神论构成了文学革命的两个维度。

一、胡适文学工具论

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在谈论形式革新方面多于内容革新，后人将他的文学革命称为改良主义，以区别于陈独秀的文学革命。他的“文学的国语，国语的文学”口号，侧重于新文学语言形式的建设，指向新文学的文字工具的白话性，并将白话文字当作与古典文学不同的活的文字，是与文学精神、内容相关的，甚至是重要的方面。他最主要的目的是建设一种能作一切文学工具的白话文字，在他看来“文字形式”往往是可以妨碍束缚文学的本质的，“旧皮囊装不得新酒”^①。他提倡白话文学，并将文字的解放当作一生的事业来做，与他对于新文学的理解密切相关。首先，他看出了中国文学除了文人创作的文言死语言作品外，还存在着白话文写作的活的文学历史，并且白话文学在中国文学历史发展中成了一种趋势。这种理解基本符合中国文学发展的实际，中国文学从韵文这方面说，经历了从诗歌向词然后向曲发展的过程，表现出了日趋世俗化和生活化的趋向。小说则从明清开始，民间流传的故事经文人搜集整理创作，出现了经典的作品，这种写作始于市井，文词通俗，语言贴近生活，在胡适看来是白话文学的重要方面。虽然文言小说与白话小说并头发展，但其成就与影响不能与后者相较。散文在唐宋之后不断在复古、拟古的泥淖中往复，明末公安、竟陵派诸人向复古、拟古宣战，抒写性灵，表达自我，为散文带来了鲜活的生命，同时文字上更追求浅近易懂，被周作人引为同调，甚至把新文学的发展源头推到了这里。因此，文学革命用白话代替文言就不仅是现实的需要，还是历史发展的趋势，胡适由此为文学革命的文体、语体革命寻找到了历史依据。其次，他的白话文学革命思想不仅是内发的还是外烁的。他把文学革命作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的一部分，在世界近现代文化史和文学史的参照中找到了

^① 胡适：《逼上梁山》，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46页。

文学革命的现实依据。他这样披露发起文学革命的意图：西方各国文艺复兴都是从民族的现代语言、现代文学的创造开始的，假若中国白话文学不遭到八股文和复古主义的侵扰，也能成就白话的现代文学。“但丁之创意大利文，却叟之创英吉利文，马丁路得之创德意志文，未足独有千古矣。”^①“欧洲的文艺复兴就是把古文废了。”“意大利有一个大文学家最先用他本国的白话写诗、写散文、写小说、写戏剧……只有他有勇气管意大利创造了新的文字、活的语言。”^②胡适把自己的白话工具建设与文艺复兴时期西方巨子比匹，自我期许不能说不高。他的思想也得到了蔡元培的呼应：“欧洲近代文化，都从复兴时代演出”，中国“五四运动的新文学运动，就是复兴的开始”^③。胡适一方面用新眼光从中国文学历史中发现真正属于“时代文学”的东西，另一方面他从西方文艺复兴中发现了中国文学革命的“现代性”意义，这种意义不仅是延续中国既有的白话文学传统，还在于它是创造了“现代”概念、现代文学观念。胡适不惮其烦地强调其文学革命工具建设的重要性，都与他理解的文学革命目的和性质相关。民族的现代语言建设的重点正与西欧文艺复兴起源于民族语言一样，是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前提。他对中国白话文学历史的叙述，和将中国白话文学运动与西方文艺复兴联系起来，是为了将正在发生的文学运动历史化，同时在与历史上白话文学相区别中突出其现代意义。“中国的文艺复兴，不是徒然采用了活的文字来做教育的工具，同时是做一切文学作品的工具的一种运动。”“凡是中国的伟大的文学作品，都是由大众们产生出来的，并不是由那些学者读书人们产生出来的——他们实在忙着研究那死文字哪！千百年来的销路最好的惊人的民歌、故事、小说都是出于市井之人街边说书和其他同类的很熟识语言人的手。”^④正如有的论者指出的：“在新文化运动初期，胡适倡导白

① 胡适：《逼上梁山》，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48页。

② 胡适：《白话文的意义》，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2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78页。

③ 蔡元培：《中国新文学大系1917—1927·总序》，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

④ 胡适：《中国的文艺复兴》，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2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2页。





话文，发起文学革命，便是受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国语运动的启示；在‘五四’运动前期的启蒙高潮中，他张扬人的价值，鼓吹个性解放，认为这是文艺复兴运动的人文主义实质；在‘五四’运动后期，他发动整理国故运动，致力于传统的价值重估和传统资源的开发，提出‘再造文明’的新目标，则类似于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对古典文明的复活。而这三个方面的逐次展开，便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中国文艺复兴’运动。”^①胡适的白话文学倡导、启蒙文学观和整理国故运动都着眼于文艺复兴、文明再造，在文学活动中他对于白话工具的强调和不遗余力的理论倡导、创作实践都基于此，在他的思想里，白话文学不仅是工具革新的成果，还是中国现代文明必须建设的部分。

4 | 胡适最初急切地建设与古典文学相区别的有现代意义的文学，虽然在寻找历史依据时他发掘了中国文学的白话历史，可是建设新文学却不容易借用传统文学体式和语式，因而开创性的探索是非常必要的。关于如何建设新文学胡适有比较明晰的思路，他说：“我的《建设新文学论》的唯一宗旨只有十个大字：‘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有了国语的文学，方才有文学的国语。有了文学的国语，我们的国语才可算得真正国语。”“我以为创造新文学的进行次序，约有三步：（一）工具，（二）方法，（三）创造。前两步是顶备，第三步才是实行创造新文学。”^②文字工具最基本也最重要，它是新文学创造的前提。其所说的方法应该是指各种文体的具体的规定性，这种规定性是要在古今中外的文学传统中凝练出来的。创造新文学更是新文学革命的最终目的，在检验理论、方法正确与否它最有发言权。新文学在挣脱传统的束缚后的虚无和失重，不能仅用反叛传统的姿态解决。胡适的理论、方法甚至创作尝试在今天看来可能显得极为平常，但是开路之功和实践之难只有回到历史语境中才能体会。胡适最早在诗歌方面进行尝试，因为在小说方面他与梅光迪等人取得了共识，白话可以创作小说。而胡先骕、梅光迪、吴宓却不承认白话

① 洪峻峰：《思想启蒙与文化复兴：五四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32～33页。

② 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2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45页，第50页。

能创造诗歌。为此他从1915年至1917年间尝试用白话写新诗，其成果后来以《尝试集》结集出版。当年任叔永、梅光迪承认白话能作词曲、小说，却不能作诗、文，这在胡适看来是由他们保守的文学观决定的：诗、文为文学正宗，小说、词曲乃小道^①。所以胡适率先尝试白话诗歌创作，不仅为白话新诗辩护，还有就是打破传统的保守的文学观念。笔者无意对胡适文学革命功绩进行全面评价，但是一方面从整理国故角度，他将新文学建设与古典白话文学的研究联系起来，寻找新文学发生的内在资源；另一方面更多地以西方文艺复兴以来的文学经验作参照，照亮了中国新文学再造之路。他的《尝试集》使用了西方诗歌的自然音节，却有中国古典诗词的痕迹。“诗的音节全靠两个重要分子：一是语气的自然节奏，二是每句内部所用字的自然和谐。至于句末的韵脚、句中的平仄，都是不重要的事。”^②“诗体的大解放就是把从前一切束缚自由的枷锁镣铐，一切打破：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③用历史的眼光看胡适为打破保守僵化的传统的诗歌观念，出语有纠缠过正之嫌，这是历史形势使然。至于他的新诗创作，其实比较复杂，并不是如他所说“有什么话，说什么话；话怎么说，就怎么说”，他对自己的诗自谦为“放脚体”，有古典诗词格律痕迹，其所以这样，应该说胡适心中还有一个“什么才是真正的诗”这么一个结，诗最终有体式、形式和语式等方面的约定，如何用白话创作出具有“诗味”的新诗，这个历史任务只有待他人完成。

现代小说形态除了语体工具现代化外，还有文体的现代化，他在《论短篇小说》中将短篇小说定义为：“短篇小说是用最经济的文学手段描写事实中最精彩的段，或一方面，而能使人充分满意的文章。”^④差

① 胡适：《逼上梁山》，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54～155页。

② 胡适：《谈新诗》，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1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41页。

③ 胡适：《〈尝试集〉自序》，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9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82页。

④ 胡适：《论短篇小说》，见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2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04页。



不多成了后人的金科玉律。在戏剧方面，他在《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批判了中国戏曲的“团圆主义”，用易卜生主义将写实的反封建的思想引入戏剧中，创作了中国第一个问题剧本《终生大事》。这些努力显示了胡适对于新文学的实践精神，他抱定建设国语的文学宗旨，用白话工具和现代精神思考和创作现代文学，显示了新文学最初的成果。当然胡适思想中的现代科学实证主义在他的文学思想和创作实践中起了一定作用，其实践和尝试精神就是这种思想的表现。胡适曾感叹“提倡有心，创作无力”。他明白自己只是个开拓者，是一个过渡者。新文学成熟的形态必待对于西方近现代文学研究译介到相当程度才会出现，这个任务有待后人完成。

二、陈独秀与《文学革命论》

与胡适不同的是，陈独秀是革命式的学者，他从辛亥革命的失败中领悟到中华民族文化的振兴在于人的觉醒，改造人的途径主要在于新思想的传播。他举起了文学革命旗帜，骨子里却眺望着文化革命和社会革命。不过在用文学为手段进行中华民族文明的再造这方面，他与胡适是一致的，汪晖称这是五四时期的“态度的统一”^①。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与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起被认为是文学革命开端的标志。在《文学革命论》中，陈独秀提出了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瞭的通俗的社会文学。”与胡适温和的态度、学术的语调相比，陈独秀以其思辨色彩和精神力度显示了文学革命的思想 and 情感的高度。他的论调主要从破坏旧文学体系，批判旧文化的价值观念方面提出新文学可能发展的方向。正如有的论者指出的，“这场文学革命的目标就远远超出了对一种文学风格的破坏。这场革命的反对者所保护的是一个完整的社会价值体系。而对文言之僵死古风与旧文学之陈词滥调的文学革命的拥护者，

^①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陈独秀文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260～261页。

所抛弃的也是一个完整的文化与社会遗产”^①。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运动中所表现出的激烈态度和对于旧文学、文化价值批判的否定力度，显示了他与胡适改良主义思想不同的革命性，这也是日后他们走向不同道路的深层原因。胡适的实证主义方法指明可操作的途径，达到建立新文学的目标，其步骤和方法在科学主义的框架内，合乎新文学开拓时期的需要：在混乱和新旧文化交错的局面中，找到一个可供操作的方法，为新文学趟出一条路子。陈独秀则以“思想明星”的威力，对于旧文学、旧文化作出整体性的否定，以西方思潮为参照，指出了新文学的革命性质。他讨论的是文学，思维方式上却是“革命式”的，着眼的是思想革命，却暗含了政治革命、社会革命的整体性变革的实质。

从陈独秀在文学革命时期的言论和后来的职业革命生涯看，其志并不完全在文学上，但是他对于文学革命的意见却具有革命指导性。首先，他十分肯定地将旧文学放在将要诞生的新文学的对立面上，整体否定了传统的贵族的、迂腐的古典文学，尤其是将古典文学中正宗的诗、文判定为复古、拟古的文学，与世界先进文学不能相提并论。他将明代前后七子及八家文派之归、方、刘、姚称为十八妖魔，并以极大的豪情说：“有不顾迂儒之毁誉，明目张胆以与十八妖魔宣战者乎？予愿拖四十二生的大炮，为之前驱！”^② 这种开山辟路的不妥协精神深为胡适所钦佩。没有陈独秀在新旧思想斗争中的决绝斗争精神，新文学不可能那么顺利站稳脚跟。其次，他将世界文学潮流引入中国，改变了古典文学与国民、社会和现实脱节的窘迫局面。他鲜明地提出了文学国民化、社会化和写实化。输入欧洲 19 世纪的现实主义文学精神，以现代民主精神为内核，呼唤中国文学与现实人生结合。中国新文学出现之前，诗歌和纯文学一直是雅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但是普遍没有将文学作为高雅的自主的职业，文学为余事，依附于人格的自我修养，文学的贵族倾向和文学的雕琢阿谀的形式主义使得文学只是少数人的“专利”，只

① (美) 格里德：《胡适与中国文艺复兴——中国革命中的自由主义（1917—1950）》，江苏人民出版社 1989 年，第 81 页。

②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陈独秀文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第 263 页。





是载道或人格自我求证的事物，是新文化运动“有效地展开新的白话‘雅文化’文学，将小说这种体裁提高到了雅文化的地位”，其原因“在极大程度上是由于把小说和小说应‘为生活服务’的看法结合了起来”^①。陈独秀关于新文学革命论调主要涉及对旧文学的整体评价，涉及新文学的发展方向，奠定了新文学革命的精神，因此既与改良主义的胡适互相呼应，更与钱玄同、刘半农等五四诸子意见相同，形成了一股巨大的强烈的反旧文学势力。

胡适与陈独秀在其论著中表达了新文化先驱者对文学现代化的期待，从文学精神上将文学从古典文学的贵族化倾向中走出来，与社会现实、国民人生联结起来，用西方写实主义精神为中国新文学奠定了现代的艺术精神。尤其是胡适的文学工具革新，培养白话语言为一切文学工具的努力，更从文学形式方面改变文学形态，他的创作尝试是中国新文学最早成果，也是实践其文学革命思想的成果。这些表达了他们对文学现代化的设计和期待，为后来新文学具体实践提供了理论指导和形式启示。

第二节 《中国新文学大系 1917—1927》： 文学现代形态的历史化冲动

一、时代精神催生下的《大系》

1935年由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年轻的编辑赵家璧出面，策划组织编纂的《中国新文学大系 1917—1927》（简称《大系》）看似是个偶然的出版事件，实际上是一个必然事件，它受到了时代文化的制约，更与新文学必然历史化的趋向相关。作为30年代“一部最大的‘选集’”，有“保存‘文献’的用意”，长序还体现了“文学史发生”^②。《大系》的编纂是在国民党大肆围剿革命文学，公然反叛由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创的现

^① 费正清，费维凯：《剑桥中华民国史》（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321页。

^② 赵学勇等：《〈中国新文学大系 1917—1927〉研究述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年第5期。

代文化的时候，开始了对第一个十年文学的检验和总结。它是对倡导复古、读经和把早已不成为悬念的“文言和白话”之争的问题再次提到人们面前的30年代的复古逆流的明显抗争。参与编辑诸人都亲历了五四新文学，他们把《大系》工程当成是五四新文学在30年代日渐失去历史影响力的情况下的一次“历史化”渴望的表现。所以，《大系》不仅仅是普通的文学资料汇集和整理，它具有特定时代背景下重建或重新强调五四文学传统的目的。

年轻的赵家璧能够完成这么一项伟大的工程，至今还影响着新文学大系的编纂模式。究其原因众多的文化名人的襄助，30年代特殊的文化和时代背景的促成。赵家璧开始谋划《大系》的时候，进步文化和文学正处于受打压的状况。那时方兴未艾的左翼文学力量在上海正遭受国民党的反革命“围剿”，与反革命的文化“围剿”相应的是国民党当局文化复古行为。赵家璧清楚地描述了当年萌生编纂《大系》时的情景：

当时正值国民党提倡复古运动，叫青年学生尊孔读经；进步的文化人都认为应当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的革命传统，才能拯救中国。五四运动离开那时不过十多年，但是诸多代表作品已不见流传，文学青年要找这些材料同古书一样要跑旧书摊。^①

国民党当局一方面倡导尊孔读经，从文化复古上抵制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从根本上否定“五四”以来的新文化和新文学；另一方面用政治高压手段对图书出版进行查禁。1934年中央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成立，加大对左翼和进步的图书刊物的禁查力度。据统计，仅1934年2月国民党中央宣传委员会发布密令，一举查禁图书149种，著名左翼作家的重要著作几乎都网罗在内。开明书店、现代书局、亚东图书馆、北新书局、商务图书馆、良友图书公司、湖风书局、光华书局等大型出版机构都有出版物被查禁。其中现代书局被查禁的有12种，禁止发售的有5种，暂缓发售的有4种，暂缓执行查禁的有5种，被强令删改的有2种，一共是28种。楼建南所著《挣扎》禁止发售的理由是“内容描写自己在过去苦闷生活中的挣扎，文字中对于现状异常不满，并带煽动词

^① 赵家璧：《编辑忆旧》，《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3期。



句”。鲁迅的著作被查禁、禁止发售和删改的共有七种，茅盾则有十种之多^①。鲁迅抄录了1934年3月14日的《大美晚报》上一则新闻，记录了图书杂志委员会禁止图书出版，摧残进步文艺的事实。“沪部党部于上月十九日奉中国党部电令，派员挨户至各新书店，查禁书籍百四十九种之多，牵涉书店二十五家。”^②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在南昌成立以推行封建道德为准则的“新生活运动促进会”，规定以后孔诞日全国举行祭孔纪念，随之提倡读经，一时以尊孔读经为主要方式的逆流在各地泛滥起来。让进步作家最难以忍受的是上海旧式文人借政治高压发起了对新文学的进攻。连林语堂这样的新文人也在政治高压下力倡“抒写性灵”，对于“五四”以来的白话文学颇有微词。文言白话的争论又一次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鲁迅说：“别一枝讨伐白话的生力军，是林语堂先生。他讨伐的不是白话文的‘反而难懂’，是白话的‘鲁里鲁苏’，连刘先生（刘半农，作者注）似的想白话‘返朴归真’的意思也全没有，要达意，只有‘语录式’（白话的文言）。”市面上替人写书信的文体，“分明是‘语录式’的，这就是现在从新提起的语录派的末流”。鲁迅敏锐地发觉林语堂提倡“小品文”的反白话实质，林语堂那“恶白话之文而喜文言之白，故提倡语录体”反白话文退隐的本质昭然若揭。^③文言白话的再次论争又夹杂了大众语的讨论。真实的背景是“文化复古”、“文言复兴”，针对的是继承了新文化传统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

这一年，大量古书成批翻印，报上经常刊出满幅广告。这些出版物对整理国故确实起一定的作用，但这么多大书店，集中一个时期翻印这么多古书，也不免为弥漫社会的复古之风助长了声势。^④

复古的思潮重新泛起，与进步作家和出版业遭受到严厉的压制，使得赵家璧的《大系》计划从一个偶然的出版事项与抵抗复古思潮，弘扬五四新文学精神联系在了一起。而左翼作家在这一事件中起到的至关重

① 倪墨炎：《三十年代反动派压迫新文学的史料录》，《新文学史料》1989年第1期。

② 《鲁迅杂文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843页。

③ 《鲁迅杂文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82页。

④ 赵家璧：《话说〈中国新文学大系〉》，《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1期。

要的作用显示了《大系》编纂隐藏着有政治背景的两种文化的斗争，鲁迅、阿英、茅盾、郑伯奇等人加盟《大系》编辑，改变了《大系》编辑的“中性”色彩，左翼力量的参与和他们在编辑中对于五四新文学进步因素的大力发掘强化了《大系》对抗复古思潮，证明或发展了革命的进步的文学思想。赵家璧主要是利用他当编辑时交往的文艺界人士来主持策划《大系》工程，比如郑伯奇，他对赵家璧的革命人生道路影响比较大，赵这样回忆他良友的老同事：“如果没有伯奇，我不可能走上进步的文艺工作者道路；如果没有伯奇，‘良友’也不可能出版那么多当时曾发生过一定影响而至今还受人称颂的文艺作品。”^①他在构思和策划《大系》过程中得到郑伯奇的许多帮助，比如与阿英的联系，就是因为郑伯奇的关系。阿英与郑伯奇、夏衍秘密参加明星影片公司，常常一起谈工作，赵家璧由此结识了阿英。阿英对赵家璧的《大系》十分支持，并尽量提供自己收藏的新文艺书籍和期刊，还有许多五四时期的初版本子。他的《中国新文学运动史资料》启发了《大系》的形式，增加了资料和文学理论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并且另辟三个专集突出了五四新文学中发生的思想论争和理论建设以及史料索引。鲁迅参与《小说二集》的编辑，由于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胡乱删改鲁迅文章，鲁迅参与《大系》的计划差点流产，是郑伯奇从中周旋，鲁迅才没有退出，小说集的编选才顺利完成。

编辑思想上左翼人士更突出了《大系》政治上、思想上的意义。阿英认为《大系》“这样一套丛书，在当前的政治斗争中具有现实意义，也还有永远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其意义可以说是高于翻印一切古籍，在中国文化史上这是一件大事”^②。郑振铎把《大系》编辑工作也看作是对于复古者们思想的有效反驳：“至少是有许多话省得我们再重说一遍。”

《大系》的出版“是对一个流动当中的文学过程，作相对定形的有序整理”，“也是当事人对这个文学发难期的荣誉权，进行再分配”^③。

① 赵家璧：《回忆郑伯奇同志在“良友”》，《新文学史料》1979年第5期。

② 赵家璧：《话说〈中国新文学大系〉》，《新文学史料》1984年第1期。

③ 杨义：《新文学开创史的自我证明》，《文艺研究》1995年第5期。